



《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 英译研究

A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KINSHIP TERMS IN
HONG LOU MENG



严苡丹 著





《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英译研究

A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KINSHIP TERMS IN *HONG LOU MENG*

严苡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英译研究/严苡丹著. —上

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 - 7 - 5446 - 2800 - 6

I. ①红… II. ①严… III. ①《红楼梦》人物—亲属称谓—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 9 ②I207. 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208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许进兴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2800-6 / H · 1357

定 价: 2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红楼梦》是诞生于 18 世纪中叶的一部伟大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红楼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性质上说,本研究属于定性研究,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对《红楼梦》及其两个英译本中的亲属称谓语做一个系统和完整的梳理与描述。但研究并不止于描述,更重要的是要探索这种情况存在的理由以及其背后隐含的意义。另外,研究过程中笔者在搜索原始数据和对数据进行分析时,也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对亲属称谓语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

本研究对于称谓语的英译探讨是基于《红楼梦》乔译本和霍译本的比较。学术界鲜有对上述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乔译本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笔者希望以此为开端,打破这种失衡格局;同时,本书对《红楼梦》前八十回及其两个英译本中出现的所有亲属称谓语进行穷尽性研究,弥补了以往杂谈、漫谈式研究的不足,为《红楼梦》及其翻译研究提供更全面翔实的资料;另外,此研究的性质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虽然描述翻译学是本研究的主体理论框架,但研究的起点是两个译本中称谓语在语言层面的转换。本书从静态、封闭的文本系统入手,由内而外,至语言体系的外部系统分析而终,说明即使从外部因素来讨论翻译,也仍然需要对在源语和译语文化语境下的语言转换进行描写与分析,翻译研究始终不能脱离翻译的根本——语言。本研究证明,将规范性翻译研究与描述性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是切实可行的,这为翻译研究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范式。

本书是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适当调整而成。整个撰写过程历历在目,从选题到定稿,一路写来自己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样的成果我深知来之不易,它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更离不开许多人的支持和鼓励。

首先,我要感谢恩师冯庆华教授。先生在学术上给予我很多无私的指导和帮助,让我在这条艰辛而漫长道路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而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忘我的工作热情和温和淡泊的处事方法更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受益匪浅。其次,我要感谢上外的诸多教授,他们的治学方式给了我种种启迪。这里要特别感谢刘全福老师在论文撰写阶段给我的指导和帮助,以及无私提供给我的宝贵资料。同时,我还要感谢各位同门学友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是:方薇、田小勇、奕英、王丽艳、高莉敏、吕黎、程雪芳、章静娴、葛樱。还要感谢刘翼斌老师在选题上给我的灵感和启发。上海教育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最后,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陪伴我在成长的道路上一路走来,在我每一次茫然的时候,都是他们给予我勇气和信心;感谢他们一直给予我的支持、理解和不求回报的关爱。感谢我的先生,他主动承担家庭琐事,帮助我搜集资料,完成数据统计的工作,一直无怨无悔地支持我的学习和工作,使我没有后顾之忧。

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人。

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严苡丹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1
1.2 称谓语概念的界定及其分类	4
1.3 《红楼梦》的版本选择	7
1.3.1 《红楼梦》的中英文版本概述	7
1.3.2 本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选择	9
1.3.2.1 对《红楼梦》译本的选择	9
1.3.2.2 对《红楼梦》译本底本的选择	10
1.4 理论基础	12
1.4.1 描述翻译学	14
1.4.1.1 描述翻译学的发展概况	14
1.4.1.2 描述翻译学的内容与本研究的联系	16
1.4.2 社会语言学	17
1.4.2.1 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概况	17
1.4.2.2 社会语言学的内容与本研究的联系	21
1.4.3 两个理论的联结	22
1.5 研究步骤和研究假设	23
1.6 本书的结构安排	24

1.7 小结	25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6
2.1 国内称谓语研究状况综述.....	26
2.1.1 研究文献的统计学特征.....	27
2.1.2 研究对象的分布	31
2.1.3 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31
2.2 国外称谓语研究状况综述.....	36
2.2.1 文化人类学领域的称谓语研究	36
2.2.2 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称谓语研究	38
2.2.3 近二十年的称谓语研究	39
2.3 现有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本书的创新点	41
2.3.1 现有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41
2.3.2 本研究的创新点	43
2.4 小结	44
第三章 《红楼梦》亲属称谓语概貌及翻译.....	45
3.1 父系亲属称谓语	46
3.1.1 父系亲属称谓语概述	46
3.1.2 父系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60
3.1.2.1 基本数据比较	68
3.1.2.2 高频词比较	74
3.1.2.3 独特词比较	75
3.2 母系亲属称谓语	80
3.2.1 母系亲属称谓语概述	80
3.2.2 母系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87
3.2.2.1 基本数据比较	90
3.2.2.2 高频词比较	95
3.2.2.3 独特词比较	96
3.3 夫系亲属称谓语	99

3.3.1 夫系亲属称谓语概述	99
3.3.2 夫系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101
3.4 妻系亲属称谓语	105
3.4.1 妻系亲属称谓语概述	105
3.4.2 妻系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113
3.4.2.1 基本数据比较	114
3.4.2.2 高频词比较	117
3.4.2.3 独特词比较	117
3.5 合称和互称称谓语	122
3.5.1 合称和互称亲属称谓语概述	122
3.5.2 合称和互称亲属称谓语的翻译	130
3.5.2.1 基本数据比较	130
3.5.2.2 高频词比较	133
3.5.2.3 独特词比较	135
3.6 小结	138
第四章 译本与译语社会的变迁	140
4.1 乔利译本与 19 世纪末的英国社会	140
4.1.1 19 世纪末的英国社会	140
4.1.2 19 世纪末期的中英关系	144
4.1.3 乔利译本	150
4.1.3.1 19 世纪末欧美红学的发展	152
4.1.3.2 乔利译本的序言	154
4.1.3.3 乔利译本的特点	155
4.2 霍克思译本与 20 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	162
4.2.1 20 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	162
4.2.2 20 世纪后期的中英关系	165
4.2.3 霍克思译本	170
4.2.3.1 20 世纪后期欧美红学的发展	170
4.2.3.2 霍克思译本的序言和附录	173

4.2.3.3 霍克思译本的特点	176
4.3 译语社会的变迁对译本的影响	177
4.4 小结	179
第五章 结论	180
5.1 此研究的结果	180
5.2 此研究的意义	182
5.3 此研究的局限性及可拓展的空间	183
参考文献	185
附录 《红楼梦》人文版、双清版称谓语校勘表	190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红楼梦》是诞生于 18 世纪中叶的一部伟大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红楼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陈维昭 1)。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一门学问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学术发展过程大故迭起,雨雨风风,《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刘梦溪 18)。

红学的诞生起码可以从 1754 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其评点即是最早的红学。可以说,至光绪朝,关于《红楼梦》的研讨已成“显学”。此后,不管人们用什么方法与思想阅读《红楼梦》,红学的显学地位已是不可动摇的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中,王国维把《红楼梦》展开为一个中西文化对话的平台,探讨了人的终极关怀问题。此后,这一意义阐释的维度一直延伸至今。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激励着胡适新红学的诞生,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防文学思潮,又让人们对民族文学中的《红楼梦》投去赞赏的目光。1954 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

“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了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至今，《红楼梦》的话题已成为网络上诸多论坛的重要话题，很多省市成立了红学会，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专门的刊物有《红楼梦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等，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红学网站。至此，红学的显学地位如日中天(陈维昭 4)。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红楼梦》自浙江的乍浦港漂洋过海，流传到东邻日本的长崎。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红楼梦》流传到国外的最早记载。从那时到现在，在近两个世纪间，《红楼梦》不仅传入了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而且它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流传到了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它被翻译成17种语言文字，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千千万万读者，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胡文彬 1)。

从清人得舆《京都竹枝词》中的一句“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中所表现的《红楼梦》风靡海内外的空前盛况，到历经二百余年从未远离人们关注的红学研究，《红楼梦》一书具有的巨大影响和不朽的艺术生命毋庸置疑，这也构成了本书选择《红楼梦》及其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

笔者的博士论文开题前夕，时逢“2009 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2009. 7. 11—13)在山东省蓬莱市举行。会议主题立足文本，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文化研究为旨归，内容涉及作者、版本、美学、艺术、《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红楼梦》的国外传播等研究领域。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120 余人出席了会议，对相关议题展开了跨越诸多领域的深度探讨(李虹 19)，这更加坚定了笔者要对《红楼梦》英译本进行研究的信心。

但是《红楼梦》研究是极为艰难的课题，作品之深厚，红学之浩繁，究竟怎样才能找到既具有研究价值又在自己能力驾驭之内的研究内容？在几经思索及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之后，笔者决定从小处着眼，以称谓语为切入点，立足源语及译语文本，在描述翻译学的框架内，结合社会

语言学的理论,探讨称谓语在翻译中所体现出的译本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人们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变化,特别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语汇——的变化,去探究社会生活的图景和变动,从而概括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陈原 229)。因为社会生活的任何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主要在语汇——中有所反应(同上 230)。称谓语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马宏基 常庆丰 15),是为适应人类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同上 16)。自古以来,称谓语就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称谓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调节,而透过称谓的形式变化,在更深的层面上,人们可以感受到社会体制的变动。可以说,称谓形式的表象是时代因素和文化因素双重影响的结果(沈锡伦 150)。时至今日,对于称谓形式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热点话题(杨永林 72)。

中国人是最为讲究称谓的,因而其称谓之多,称谓之细,称谓之复杂,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籍秀琴 148)。《红楼梦》一书被周汝昌先生归为中华之文化小说,称其充满了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红楼十二层 4),写尽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同上 6)。等于把当时整个社会搬入书中,充分表现了当时社会豪门贵族的文化生活,也写到当时的市井、农村、寒门小户,几乎写全了整个社会由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以及各种奴婢的生活全貌和种种心态,足以代表当时的文化全貌(邓云乡 名物谭 310)。小说中出场人物达几百名之多,其间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属关系更是极其纷繁复杂。具体说来,从纵向看,作者描写的中心贾府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从“水”字辈到“草”字辈,共涉及五代血缘关系;从横向看,史、王、薛三大家族与贾家又有着纵横交错的血亲、姻亲关系。因此,《红楼梦》一书中反映这种复杂的亲属关系的语言符号——亲属称谓语——系统自然也就十分复杂。而在交际过程中,由于君臣、主仆、同僚及朋友的社会关系的介入,使得书中亲属之间相互称呼所形成的亲属称谓系统与亲属词系统并不完全一致,也更加复杂。所以,《红楼梦》一书所表现的汉民族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相互称谓的状况,非常集中且很有代表性,它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封建

社会中亲属称谓的全貌(孙炜 115—116)。因此,选取《红楼梦》中的亲属称谓语及其翻译作为切入点,进而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具有其研究价值和可行性。

本书选取进行比较的两个《红楼梦》译本分别是 1892 年到 1893 年间出版的乔利(H. Bencraft Joly)译本(以下简称“乔译”)以及 1973 年到 1980 年间出版的霍克思(David Hawkes)译本(以下简称“霍译”)①。这两位译者都是英国人,乔译本产生于 19 世纪末的英国,而霍译本产生于 20 世纪后期的英国。那么,前后相差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两个译本在对亲属称谓语的翻译上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果存在差异,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观察和分析这些语汇翻译上的差异,是否可以探究出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图景和变动?这些差异是否是译者所在时代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都是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亦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1.2 称谓语概念的界定及其分类

称谓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类有了语言就有了称谓语(马宏基 常庆丰 1)。但称谓语数量众多,纷繁芜杂,而且《红楼梦》中出现的称谓语距今已有两百多年之久,有些已经不为现代人所熟悉。因此,如何界定称谓语的概念是研究《红楼梦》称谓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

书面上“称谓”一词据袁庭栋(9)考证,最早见于《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所载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书启:“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号,详案旧典。”而贾娇燕(2)根据《汉语大词典》的书证和其他相关论述指出,“称谓”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郎顗传》:“今去奢即俭,以先天下,改易名号,随事称谓。”以成书年代而论,当是《后汉书》中的“称谓”一词为最早。

① 关于译本选择的具体情况详见 1.3 小节,此处不再赘述。

历史上,称谓一词曾有两种意义,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一是:“称呼,名称。《后汉书·郎顺传》:‘改易名号,随事称谓。’唐刘知几《史通·称谓》:‘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二是:“述说;言说。《宋书·武帝纪上》:‘事遂永代,功高开辟,理微称谓,义感联心。’”

现代汉语中,称谓一词只有一种意义,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如父亲、师傅、厂长等”(贾娇燕 1)。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称谓语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在称谓语的概念界定上,仍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观点:

第一种,广义、狭义说。

广义的称谓可泛指一切人和物;狭义的称谓专门用于指人(田惠刚 1)。

称谓,如果广而言之,可以把在天地间万物囊括其中;而其词义缩小了的意义,即指人际之间的叫法(吕俊 39)。

第二种,称呼说,即把称谓语和称呼语等同起来。

称谓就是称呼,就是人们在交际中怎样称呼别人和自己(孙维张 114)。

人类在社会交际中所使用的各种称呼语(田惠刚 1)。

称谓词是由于人们在亲属和社会诸多关系中用来称呼的词语(钟如雄 215)。

第三种,名称说,即称谓词是标示关系、身份的名称。

表示人们相互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等的一套名称系统(么孝颖 21)。

称谓语指称对象是人的,由于身份、职业、性别等而得来的,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一套名称(马宏基 常庆丰 5)。

第四种,称呼名称说,即称谓词是用来标示身份的名称及用来交际的称呼。

现代汉语称谓系统首先可以分为面称和背称。面称就是称呼性称谓，背称就是指称性称谓(崔希亮 36)

称谓系统包括名称系统和称呼系统两大类。“称谓”是交际主体在语言交往中处理主体间关系、进行人际定位的一种语言活动。“名称”是标示某人存在的名词或名词性概念，是称谓的语言形式(姚亚平 94)。

基于上述几种说法，本书根据称谓语的实质及其在《红楼梦》一书中的具体使用情况，把称谓语界定为：人们由于亲属和各种社会关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或在交际中用以称呼的词语。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称谓词语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其使用的名称并不统一。从上述引用的称谓语界定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主要使用的名称为：称谓、称谓语、称谓词。郑献芹(182)曾做出统计，“称谓”一词的使用数量是最多的。从语法功能看，“称谓语”包括“称谓词”和“称谓短语”；“称谓”是“称谓语”的简称，二者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都是一致的。但是“称谓”一词太过笼统，在学术研究中使用显得不够清晰严谨。鉴于本研究包括词和短语两类，因此取“称谓语”的说法。

根据不同的标准，称谓语的分类也有所不同。从功能的角度，可分为名称称谓语和称呼称谓语。其中名称称谓语又可分为姓名名称、身份名称和关系名称；称呼称谓语在语言所指上，分为自称、面称、背称；在交际关系上，分为直接称呼(从己称)和间接称呼(从人称)；在人称数量上，分为单称和合称；在对象范围上，分为专称和通称(姚亚平 94)；从内容的角度，可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其中亲属称谓语又可分为亲属称谓(只用在亲属之间)和拟亲属称谓(用在社会上成员之间)；社会称谓语按交际功能又可分为社交称谓、关系称谓、职衔称谓(郑尔宁 121)；从语体的角度，可分为口头称谓和书面称谓；从礼貌、情感的角度，可分为谦称、敬称、昵称、傲称、蔑称和戏称等(马丽 16)。

总之，称谓语的分类并没有唯一的标准，每个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进行分类。本书在称谓语概念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按照内容对《红楼梦》的称谓语进行划分，即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两类，然后对亲属称谓语做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1.3 《红楼梦》的版本选择

版本是红学研究的本源,它关系到广大读者及研究者以哪个本子为《红楼梦》的真本,作为阅读、鉴赏、研究的对象(欧阳健 215)。从理论上讲,版本研究是文本研究的基础,想要对《红楼梦》文本进行价值阐释,研究者首先面对的就是版本问题。

在这一节,笔者将对《红楼梦》的版本以及本研究中对《红楼梦》版本的选择进行介绍。

1.3.1 《红楼梦》的中英文版本概述

《红楼梦》的创作,经历了“增删五次”的过程,有人认为这五次增删,都可能有各自的版本流传于世。而它的流传情况,又增加了其复杂性。《红楼梦》的最后一次定稿,完成于乾隆庚辰年(1760)。而书的付梓,却是在乾隆辛亥年(1791)。在此之前,它一直是以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作者的增删,抄手的讹误,后人的校改,使它的版本现象变得极为错综复杂(郑向前 307)。

《红楼梦》的版本一般被分为两大系统:脂本系统和程本系统。事实上,在程甲本出版之前,已经有八十回本的《石头记》和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存在,只是程本之前的这部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至今尚未现世。关于《红楼梦》的版本,根据冯其庸、李希凡先生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所载,就有 146 种(其中包括一些未见版本)。据魏绍昌先生的《〈红楼梦〉版本小考》,现存版本中文部分有 30 种。如果再加上此后发现的新版本,就不止这个数字了(陈维昭 86—102)。

目前已出版的《红楼梦》英译本共有 11 种(江帆 20),其中全译本 2 种:一部是杨宪益、戴乃迭(Gladys Yang)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书名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三卷,第一、二卷 1978 年出版,第三卷 1980 年出版。译本包括《红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全部内容；另一部是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与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翁婿的译本，书名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英国企鹅出版公司(Penguin Books)出版。其中前八十回由霍克思翻译，分三卷出版，三卷的副标题分别为 *The Golden Days* (1973)、*The Crab-Flower Club* (1977)、*The Warning Voice* (1980)。1982年至1986年，闵福德翻译了后四十回，在同一书名下分两卷出版，副标题分别为 *The Debt of Tears* (1982) 与 *The Dreamer Wakes* (1986)。这两个全译本可谓各有千秋，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得到了广泛认可，其问世在《红楼梦》英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1892年到1893年间出现的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红楼梦》英文节译本，书名为 *Hung Lou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译者是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乔利。该译本完整地翻译了原著前五十六回的内容，分为两卷，由香港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及澳门商务排印局(Typographia Commercial)分别出版(江帆21)。乔利本打算翻译整个一百二十回，可惜因去世而未能如愿。该译本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前五十六回论则为全译本，以一百二十回论则为节译本。在《红楼梦》的英译史上，乔利的《红楼梦》英译本是第一个带有真正全译性质的译本，不但大大超越了此前零散的摘译片段，而且对后来的英文全译本译者霍克思和闵福德翁婿、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有所启示。因此，乔译本在英译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王金波 277)。该译本重印多次，至今在市场上还有出售。

除上述11种公开出版的英译本之外，在2004年7月，香港大学图书馆在其主页以电子版本的形式发布了英国传教士布拉姆韦尔·西顿·邦斯尔神父(Reverend Bramwell Seaton Bonsall, 1886—1968，中文名彭寿)《红楼梦》英译文的完整打印修订稿。该译本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是杨译本以及霍译本问世之前世界上第一个一百二十回全译本。该译文虽然未能以书本的形式正式出版，但其电子版本的发布同样堪称《红楼梦》英译史上的里程碑(王金波 王燕 195—209)。